



China: 5000 years

中国通史
简明教程

下册 魏宏运主编

中國通史簡明教程

下 册

魏 宏 运 主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112号

DRS2/02

中国通史简明教程

下册

魏宏运 主编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激光照排技术部照排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20 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258

ISBN7-04-003985-0/K·191

定价 7.15 元

(精装)

目 录

第十一章	五四运动..... 1
一	科学与民主..... 1
二	五四爱国运动..... 6
三	思潮和信仰 11
四	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五	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 20
第十二章	国民革命 26
一	广东革命政府 26
二	国共合作的形成 30
三	革命高潮的出现 33
四	统一广东和广西 37
五	北伐战争 40
六	在解放了的土地上 43
七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 47
第十三章	内战与危机 52
一	红白区的对立 52
二	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 58

三	1930年的战乱和天灾	62
四	围剿与反围剿	65
五	“九一八”	70
六	长征	76
七	日本蚕食华北	80
八	西安事变	83
九	国民经济的发展	88
<hr/>		
第十四章	抗日战争	93
一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93
二	西迁和东进	103
三	武汉会战时期	109
四	国共磨擦和国共两个战场	113
五	外战与内战	118
六	中国战区的出现	122
七	新政策与新措施	124
八	艰苦的战争	129
九	国共两个战场的不同命运	135
十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40
<hr/>		
第十五章	解放战争	145
一	重庆谈判	145
二	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149
三	蒋介石处于全民包围之中	153
四	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化	158
五	政治的前景	162
六	红旗漫卷半个中国	166
七	北平和谈	170
八	金陵王气黯然收	174

九	新中国基石的奠定·····	178
第十六章	前进、曲折、建设的年代·····	182
一	新中国诞生·····	182
二	恢复国民经济·····	184
三	抗美援朝·····	187
四	政治体制的确立·····	190
五	一化三改·····	194
六	向科学进军·····	200
七	三面红旗和经济建设的失误·····	204
八	中苏中印关系的恶化·····	209
九	国民经济的调整·····	213
十	前进中的隐忧·····	217
第十七章	文化大革命·····	223
一	“文化大革命”的轨迹·····	223
二	混乱的社会生活·····	228
三	坎坷的经济建设之路·····	232
四	外交的突破·····	236
五	悲喜交集的年月·····	239
第十八章	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	243
一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243
二	伟大的转折·····	246
三	农村的历史性变化·····	249
四	改革之春·····	253
五	中国在前进·····	256
第十九章	科学、文艺、史学的巨大成就·····	260

一	科学技术的发展.....	260
二	文艺的繁荣.....	262
三	史学的兴旺.....	265

五四运动

【1915年—1921年】

一、科学与民主

1915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段时间，中国出现了难得的机会，几位知识渊博、才智卓越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倡导科学和民主，架通了中华民族文化革命与世界文化进步思潮的桥梁，使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革命，人们称这一历史现象为新文化运动。

这一运动是以北京为中心，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展起来的。

北京当时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一切言论如果不是赞许专制主义，不是阿谀奉承，就难以存在。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为清末的翰林，主张教育改革和学术思想自由，素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主张，辛亥革命成功，蔡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即废除了清代教育宗旨的“尊孔”一项。及至任北大校长，便积极实现自己的抱负，罗致了很多有名的新旧派学者。陈独秀被聘为文科学长，胡适为哲学教授，李大钊为图书馆

长。还聘请了最顽固的复辟分子，有拖着一条大辫子的辜鸿铭，拥护袁世凯帝制的刘师培等。在学术自由的口号下，学会林立，新思潮蓬勃发展起来。

新思潮的开端和发展是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标志的。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学英语、德语和造船学，后来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过法律、哲学、政治、历史和文学，对旧文学很有根底，对西方文明也有研究，极力想把中西文化融合起来。辛亥革命前，在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抨击传统思想，宣传民主自由、妇女解放、破除迷信、振兴实业等，希望中国确确实实地进步，出现一个新的时代。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主张道德、政治、哲学、宗教和文学艺术都应实行革命，因而得到了蔡元培的赏识，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历史安排的这个机遇使《新青年》也随他从上海移到北京，开始几年是他自己主编，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结识后，1918年起，六人轮流主编，鲁迅、陶孟和等也参加进来。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傅斯年、罗家伦创办了《新潮》，都是宣传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和阵地更加壮大。

《新青年》的主编们学术上都是很有威望的。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求学六年，青年时代就确立了救国救民，“再造神州”的抱负，曾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和近代的自然科学以及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毕业后，于北京和同学一起办报数月。1913年冬，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接触到河上肇和幸德秋水思想，随着政治知识的增进，再造中国的思想也日益腾高。在东京期间，他发起组织“神州学社”，写文章抨击

袁世凯的卖国活动。1916年夏回国，在北京担任《晨钟报》编辑，积极参加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他此时发表的《青春》，表达了青春的中华要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要青年去冲决过去历史的网罗，破坏陈腐学说的囹圄。思想的深刻，非他人所可比及，他的贡献不只是破坏中国传统的旧思想，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也给以抨击，是《新青年》的中坚人物。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早年入上海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生，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是著名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在美国一共住了7年，孜孜于学业，追求博士学位。1916年始致书陈独秀，谈论改造文学，并译世界短篇文学名著，投寄《新青年》，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1917年加入新文化运动行列。因其在《新青年》上较系统地提出改良文学的意见，始为人们所注目。

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师范。当时章太炎在东京民报讲学，他也去求教音韵训诂，后成为中国文学音韵学家。他看到辛亥革命后的复辟现象，很受刺激。对祖国前途非常忧虑，认为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后退之理，而中国社会却沉滞不进。封建复古成了气候，国粹派竟以保存国粹抵制科学和新知识的输入。他探索打破现状的道路，他服膺陈独秀开拓的事业。《新青年》迁至北京，他立即为之奔走，为新文化运动披荆斩棘，立下了功劳。他提出中文的书写，应由直行改为横行，用标点，用世界公历纪年，这些已被历史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刘复，(1891—1934)号半农，江苏江阴人，专治语音学，少时曾奔走革命，后在上海卖文为生，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响应《新青年》号召，积极参加新文化

运动,非常活跃。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擅长长诗和书法,在新文化运动前,是北京大学文科的革新派。

陈独秀认为,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从革命中得来的,中国应借鉴西方,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宣传科学,反对野蛮愚昧。批判不合时代潮流的封建伦理道德,革新封建主义的旧文学。

新派人物所以选择集中批判旧伦理道德,是因为二千年来,孔子的学说是中国人生活的准则,压倒了一切真理。历代统治者总是强迫人民信奉孔子的教导: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母,每个人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以稳定封建社会秩序。这是中国社会迟滞不前的症结。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论证过儒家和西方自由平等的伦理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儒家的道德是奴隶道德,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的护身符。李大钊1917年2月发表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阐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发展变化的,古今的社会不同,古今的道德自然也应不一样,新派人物对旧伦理的批判,其光辉之处在于它不是纯理论的,锋芒直指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指向北洋军阀,希望中国从专制黑暗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实行民主政治,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指向宗教信仰,偶像崇拜,迷信盲从,希冀人们以真实合理的信仰为标准;还探讨、认识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很进步的主张。

新派人物所以把锋芒还指向旧文学,是因为旧文学是旧礼教文化下的产物,多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他们主张以白话文为正宗。胡适发表于1917年1月《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2卷5号上

的《文学革命论》，揭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主张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摈弃“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传统，摆脱矫揉造作。文学革命从此蓬勃发展起来。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鲁迅 1918 年 5 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一洗过去旧小说的习套，以崭新的结构，简练生动的语言，揭示礼教和封建制度是吃人的。他通过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怀着深广的忧愤，为民族复兴，鞭鞑自己民族的弱点，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拓了道路。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早年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半年后转入矿路学堂，1902—1909 年在日本留学，开始学医，相信维新可以振兴中国。1906 年弃医，开始从事文学运动，以为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他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历代文化，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为进行文学革命确立了坚实根基。他一接受《新青年》的观点，就立即成为《新青年》最有影响的作者。

在新文化浪潮中，文学革命也深入到诗的领域。

中国旧体诗讲求格律，束缚了人们的语言及思想的表达，正是对旧诗很有根基的陈独秀，在《新青年》开辟了诗的园地，发动了向新诗的进军。新诗即所谓白话诗、语体诗，《新青年》的同人，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都为新诗的开拓而奋笔，以“诗体大解放”为口号，主张打破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从 1917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第 2 卷第 6 号到 1919 年 5 月出版的第 5 卷第 5 号，刊登新诗

83篇,还有翻译的外国著名作家如泰戈尔等人的诗多篇,使新诗声势浩大,成为诗的正宗,引起国人的注意。

继《新青年》之后,登载新诗的是《新潮》、《每周评论》,及至“五四”运动后,新诗便风行于国内各报章杂志了。

戏剧方面,新派人物也勇敢地在探索。中国的旧剧,不能全盘否定,但就中宣传淫杀、皇帝、鬼神等毒害人民的糟粕的确不少,《新青年》出于改造社会和教育人民的目的,提出有益意见,如傅斯年主张,剧本的取材应来自现实社会,应写日常生活中的事迹和平常的人。

对中国人来说,新鲜的是西洋名剧被介绍过来,如英国莎士比亚和挪威易卜生的戏剧,得到广泛传播。易卜生的作品以其鄙视旧社会制度的腐败、虚伪,向人民提示出种种社会问题,对中国反封建有积极影响。中国话剧登上舞台,“南开新剧团”曾誉满华北。

文学、社会科学、道德领域的这些变化,使“五四”运动闪耀着光芒,应该看到的是新文化运动伊始,道路崎岖难行,拥护的人渐渐多了,道路仍然坎坷不平,守旧派出了《国故》,攻击新文化,著名翻译家林纾曾致书蔡元培,攻击陈、胡,责难蔡。有人甚至想利用安福系的武人政客来压制这一运动。将新派一举廓清。但中国历史已进入新的时期,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是不可遏止的。

二、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引起五四风暴的火种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依据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民族自决”等 14 点原则，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媾和会议。苦于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对威尔逊和巴黎和会，抱有很大希望，期待英、美、法等国实现他们拉拢中国参战时许下的诺言，即中国如能参战，战争结束后将在和会上以大国相待，取消一切中德条约与战前中国所许予法国的一切权利，中国曾经派出技工和普通工人 50 万，前往欧洲战线，担负起军事工业、战地工程及后方军事设施等繁重的战勤任务，为打败德奥帝国作出了贡献。北京政府因此派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大使顾维钧及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等五人的代表团，出席 1919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和会。但巴黎的一切都使中国失望，和会完全为美、英、法、日、意五国及其组织的“十人团”所控制，中国席位被限制为两个。讨论山东问题时，美国竟提出由他们五国共管，日本因与英、法早订有获得山东权利的伦敦密约，坚持独占。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本是个亲日分子，在前往巴黎途中，特意绕道日本，与日本内田外长和牧野全权代表形成默契，事事都与日本采取共同行动。此时，不是称病卧床不起，就是携眷属赴瑞士洛迦湖畔他的别墅去玩乐，实际任务落在年轻的顾维钧和王正廷身上，他们在全国人民舆论及国外华侨支持下，撇开了北京政府和陆徵祥的束缚和控制，向和会提出了恢复主权的七条：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驻扎在中国的外国军队；取消外国在中国的邮政及电信事业；废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地及租界；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二十一条。这完全符合威尔逊的 14 点原则，而和会不予受理，只允许陈述山东问题，顾维钧慷慨陈词，据理力争，谓中国对德宣战，中德两国之间的一切条约与协定已告结束，因而德国在华权益已被取消，有关

胶州湾及山东的铁路矿山已由中国收回。演说博得各国的同情和舆论的赞扬。日本理屈词穷,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咬定1915年5月25日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和1918年9月24日与北京政府所订的中日密约,并以退出和会相要挟,4月30日,美、英、法、日四国合谋,十人会议强行通过了日本对山东青岛的要求,使其轻而易举地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日本鲸吞山东的野心得以满足。中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被置于战败国的地位。

这一屈辱的消息立即从巴黎传到北京,中国人不再相信威尔逊动听的14点和平原则。5月1日中国报纸上发出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警报,5月2日北京《晨报》刊出外交委员会干事长林长民写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书,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唤醒全国人民,“誓死图之”。民情愤激,预示着一场革命政治风暴就要到来。

5月4日北京学生以北京大学为先声,共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李大钊也前往参加,不少市民也自动加入,沉睡的、庄严古老的天安门,一时生气勃勃,成为爱国的活动中心,北京学生从这里开始了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抗争。他们的信条是: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他们的目标是:内除国贼,外争国权,收回山东权利。

三千多人的队伍,同仇敌忾,秩序井然,手持白旗,上面写着“取消廿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宁可玉碎,不可瓦全”以及“打倒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等口号,集会后便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进发,意在向英、美、法、意等国递交关于山东问题的抗议书,东交民巷使馆区以辛丑条约为根据不许学生

通过，愤怒已极的学生直奔东城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喊声震天，曹汝霖仓卒逃遁，示威群众冲进曹宅时，适遇驻日公使章宗祥，于是发生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之举，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从此一发而不可遏止。

学生的爱国行动于政府和民众间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北洋政府总统宝座上的徐世昌，本是曹汝霖等的同伙，二十一条签订时任国务卿，1918年与日本订立密约的也正是他本人，所以对学生特别仇恨，利用手中的权柄，逮捕了32名学生，宣布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把学界的举动加罪于北京大学，把北京大学学生的举动加罪于校长蔡元培，蔡被迫出走，对曹汝霖等则保护起来，为他们的卖国行为多方辩解。关于日本对山东权益的攫取，则取顺应态度，准备在和会上签字认可。

全国各界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空前的同情与声援，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苏州、开封、安庆、广州等城市举行了各种类型的集会，罢课、讲演、抗议、示威、此起彼伏，要求惩办卖国贼，争回山东，取消密约，释放被捕学生。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各界人士组成国民大会，动员民众，作学生的后盾。许多省议会也发出通电，表示站在学生一边，痛斥曹汝霖等是“国家妖孽，人民公敌”。各种爱国团体应运而生，如“铁血公民团”、“恒心救国团”、“正义团”、“工界青年励志会”等等，其中有思想更为激进的，除对曹、陆、章三人外，还主张打倒徐世昌，段祺瑞、徐树铮等大卖国贼及其卖国政府。

各地学生联合会相继诞生，并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全国学生联合会也随之成立于上海。

获得国人广泛支持的学生运动迅猛异常，由城市扩展到郊区，并延伸至农村，由山东问题引起和发展起来的抵制日货运动，把城镇乡村民众卷入革命洪流之中。

6月初,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范围更加广泛。6月3日,北京学生沿街演讲,被捕者达1100多人,4日,又发生大逮捕。其后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上街散发他们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主张打倒北洋卖国政府。陈独秀在前门外新世界剧院遭到逮捕,住宅被抄。当北洋政府正在得意于他们的镇压政策之时,上海的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声援北京学生,成为运动的主力,赋予五四运动更强的生命力。从6月5日到10日,上海商号一律关门停止营业,各行各业的工人,相继罢工,铁路、航运、市内交通均停止运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全市陷于瘫痪之中。上海是中国最大的产业中心,最大的口岸,也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最大基地,整个上海卷入革命之中,北洋政府脚下的基石就动摇起来。接踵而来的还有天津、武汉、九江、南京、镇江、杭州、厦门、山东、安徽等地罢工、罢市和罢课,镇江各商店门前贴有“废密约”、“复青岛”、“释学生”、“诛国贼”四者缺一,誓不开门的标语。全国150多个城市投入“三罢”。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威力终于使北洋军阀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仓卒召开国务会议,于5日释放了被捕的学生,9日午夜12时,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的职务。

内除国贼的目的已初步达到,斗争的目标就集中在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理上。徐世昌政府以加入国际联盟为词,坚持要签字。运动的中心内容发展为拒签,举国上下,一致行动,各省一面派出请愿团到北京总统府给徐世昌施加压力,一面致电巴黎中国使团,通电达七千多份。当时在海外的华人,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各组织和华侨代表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声称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签字之日,万余华人包围代表团住所,阻止代表出席会议。